

主編 李天綱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社会学（第三辑）

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

〔法〕塞纽博(Seignobos)著 张宗文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主编 李天纲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社会学（第三辑）

社会科学 与历史方法

〔法〕塞纽博（Seignobos）著 张宗文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社会科学史与历史方法/李天纲主编. —上海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17

(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. 社会学)

ISBN 978-7-5520-1855-4

I. ①社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社会科学—研究方法 IV. ①C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32223号

社会科学史与历史方法

主 编: 李天纲

编 纂: 赵 炬

责任编辑: 唐云松

特约编辑: 陈宁宁

封面设计: 清 风

策 划: 赵 炬

执 行: 取映文化

加工整理: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

责任校对: 笑 然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

电话总机 021-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-53063735

<http://www.sassp.org.cn> E-mail: sassp@sass.org.cn

排 版: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

印 刷: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650×900毫米 1/16开

印 张: 22.5

字 数: 300千字

版 次: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0-1855-4/C.146 定价: 110.00元(精装)

民国西学：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

——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序

李天纲

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，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。来自欧美的『西学』，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，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。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，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，激发思想，乃至产生新的理论，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。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，公元九、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，有一场著名的『百年翻译运动』之外，还有欧洲十四、十五世纪从阿拉伯、希腊、希伯来等『东方』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，汇入欧洲文化，史称『文艺复兴』。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『西学』，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，称之为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并不过分。

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，其实早有前奏。梁启超（1873-1929）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说：『自明末徐光启、李之藻等广译算学、天文、水利诸书，为欧籍入中国之始。』利玛窦（Matteo Ricci, 1552-1610）、徐光启、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，比清末的『西学』早了二百多年。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，利、徐、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、历算等『科学』著作，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《论灵魂》（《灵言蠡勺》）、《形而上学》（《名理探》）等神学、哲学著作。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『西学东渐』之始是对的，但他说其『范围亦限于天（文）、（历）算』，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，直到今天。

从明末到清末的『西学』翻译只是开始，而且断断续续，并不连贯成为一场『运动』。各种原因导致了『西学』的挫折：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；受清初『中国礼仪之争』的影响；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，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。鸦片战争以后很久，再次翻译『西学』，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。从翻译规模来看，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、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，影响力却仍然有限。梁启超说：『惟（上海江南）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，李善兰、华蘅芳、赵仲涵等任笔受。其人皆学有根底，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，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、李。』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，但说『戊戌变法』之前的『西学』翻译只在上海、香港、澳门等地零散从事，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，则是事实。

对明末和清末的『西学』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：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，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『西学』，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『翻译运动』。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，数以千计的『汉译名著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。1905年，清朝废除了科举制，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『大学堂』的方式举行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『书院』系统改造而成。新建的大学、中学，数理化、文史哲、政经法等学科，都采用了翻译作品，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，于是，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，即在『四书五经』之外，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『西方经典』，甚至到了『言必称希腊、罗马』的程度。

我们在这里说『民国西学』，它的规模超过明末、清末；它的影响遍及沿海、内地；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，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，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，但从一般直觉来看，是可以成立的。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，以及『现代化』、『世俗化』、『理性化』，都与『民国西学』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。然而，『民国西学』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？它是一

个怎样的体系？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？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，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。还有，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，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？『西学东渐』的代表，明末有徐光启，清末有严复，那『民国西学』的代表作在哪里？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，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，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、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的『西学』著作，束之高阁，已经好多年。

举例来说，1935年，上海生活书店编辑《全国总书目》、『网罗全国新书店、学术机关、文化团体、图书馆、政府机关、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』。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，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，分为：『总类、哲学、社会科学、宗教、自然科学、文艺、语文学、史地、技术知识』。一瞥之下，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『人大图书分类法』更仔细，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、学说、学科、流派更庞大。尽管并没有统一的『社科规划』和『文化战略』，『民国西学』却在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。查看《全国总书目》（上海，生活书店，1935），在『社会科学·社会学一般·社会主义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社会主义概论、社会主义史、科学的社会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基尔特社会主义、乌托邦社会主义、基督教社会主义、议会派社会主义』等；在『社会科学·政治·政体政制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政治制度概论、政治制度史、宪政、民主制、独裁制、联邦制、各种政制评述、各国政制、中国政制、现代政制、中国政制史』等，翻译、研究和出版，真的是与欧美接榫，与世界同步。1911年以后的38年的『民国西学』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，而我们却长期忽视，不作接续。

编辑出版一套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，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重新刊印，对于我们估计、认识和研究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，接续当

时学统，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。1980年代初，上海、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、庞朴先生为代表，编辑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重振旗鼓，『整理国故』，先是恢复，然后才谈得上超越。遗憾的是，最近三十年的『西学』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『接续』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，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，诸如控制论、信息论、系统论……还有『老三论』、『新三论』、『后现代』、『后殖民』等等新理论，对『民国西学』弃之如敝屣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，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，单靠『严译八种』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，还受邀请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，几份报刊的主笔。但是，像王造时（1903-1971）先生那样在『西学』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，然后借此『西学』，主编报刊、杂志，在『反独裁』、『争民主』和『抗战救国』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。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《历史哲学》、摩瓦特的《近代欧洲外交史》、《现代欧洲外交史》、拉铁耐的《美国外交政策史》、拉斯基的《国家的理论与实际》、《民主政治在危机中》。1931年，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，文学院院长，政治系主任，后来创办了《主张与批评》（1932）、《自由言论》（1933），组织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』（1932）。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、法治、理性的自由主义；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、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（见王造时著《荒谬集·我们的根本主张》，1935，上海，自由言论社）。非常可惜的是，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、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，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，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，读不到，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。

我们说，『民国西学』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，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『断裂』之后，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，哪些可以继续和发展，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。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，我

们都没有再去翻看，认真比较，仔细理解。『改革、开放』以后，又一次『西学东渐』，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『西学』，用新的取代旧的，从尼采、弗洛伊德……到福柯、德里达……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：『熊瞎子掰包谷，掰一个丢一个。』中国学者在『西学』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，在层出不穷的『西学』面前特别害怕落伍。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：更新的理论，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，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，或者借用，来解决中国的问题。这种实用主义的『西学观』，其实是一种懒惰、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，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。

讨论二十世纪的『西学』，一般是以五四『新青年』来代表，这其实相当偏颇。胡适、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『西学』，倡导『启蒙』时居功至伟，但是『新文化运动』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，也使得这一派的『西学』浅尝辄止，比较肤浅，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『民国西学』。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有一个宗旨是要『输入学理』，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知识，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，说『我们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便曾经发行过一期『易卜生专号』，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，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《易卜生主义》。《新青年》也曾出过一期『马克思专号』。另一个《新教育月刊》也曾出过一期『杜威专号』。至于对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、日耳曼意识形态、盎格鲁·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，也就习以为常了。』（唐德刚编译：《胡适口述自传》，北京，华文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191页）。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，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『真理』的轨迹。三四十年来，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，到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马克思主义；从不列颠宪政学说，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、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，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，大致就是『输入学理』运动中的全部『西学』。

胡适一语道破地说：『这些新观念、新理论之输入，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

问题。』胡适并不认为这种『活学活用』、『急用先学』的做法有什么不妥。相反，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『西学』的方法论，大多认为翻译为了『救国』，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赢仗，这就是『天经地义』。今天看来，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『实用主义』，是生吞活剥，不加消化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，或曰：是『夺他人之酒杯，浇自己之块垒』。从我们收集整理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的情况来看，『民国西学』是一个比北大『启蒙西学』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认为『五四运动』及其启蒙大众的『西学』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，在北大『启蒙西学』之外，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『民国西学』。或许我们应该把『启蒙西学』纳入『民国西学』体系，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。

我们认为：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，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，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模式，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，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。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，不中不西，并非简单的外来『冲击』所致，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。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、立场、方案、主张、主义……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，但都要在理解、消化、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，才会有更好的发挥。在这一方面，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，那便是『欲求超胜，必须会通；会通之前，必先翻译』。反过来说，『翻译』的目的，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，而非搬用；『会通』的目的，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，而是一种创新——『超胜』出于全人类的新文明。二十世纪的『民国西学』，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环节，值得我们捡起来，重头到底地仔细阅读，好好思考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，献弁言于此，是为序。

2016年3月20日，于阳光新景寓所

[法]塞紐博 (Seignobos) 著 張宗文 譯

社會科學與歷史方法

中華民國十九年二月初版

緒序

同學張君宗文。里昂中法大學之高材生也。治社會學有年。同時並研究史地學。而於各種科學。皆能窺其堂奧。歸國後。本其心得。著成社會科學與歷史方法一書。將付梓問世。而索余一言。爲弁簡端。余既受而讀之。覺含英咀華。采精擷要。說理透澈。闡義簡明。確足爲後學之津梁。而供研究社會學者之一助。因遂忘其疎愚。略抒所見焉。

夫宇宙間之林林總總。萬彙不齊。其天然之進化。蓋莫不由簡單漸進而至於繁複。卽社會間之事物。人生之營營擾擾。無非爲求生存而競爭。亦卽爲謀生活舒適而奮鬥。今吾人已由簡陋之生活。享受物質之文明。然此種人爲的進化。其程序蓋亦逐漸演進。演進不已。以有今日。則知進化之公例。無論天然人爲。要皆由簡單而繁複。由粗淺而精深。學術亦奚異於是。自結繩紀事時

代。以至有文字載籍。降及諸子百家。其間精粗繁簡。固已迥乎不同。至於近世。則各種學術皆有專科。學者分類研求。恒苦竭畢生之精力。而未能歲事。其博大精深。視昔更不侔矣。然此種學術上之進化。初非一蹴而幾。蓋亦循序漸進。惟此循序漸進之過程中。實爲一切學術所由蟬蛻遞變而成。此種過程。乃爲學者所不可忽視。而不能不加意研求者。蓋必溯本窮源。而後知枝葉之所以茂源流之所以長也。

昔人有言。行遠自邇。登高自卑。斯語也。吾於研究學術亦云。竊謂人類自開化以來。學術之進化。不外三箇時期。卽文學時期。哲學時期。科學時期是也。今人皆知研究科學必先從數學入手。不知遠古時代。卽已有天文學發明。從可知數學之源流甚長。而發明特早。較之今日。雖有精粗繁簡之不同。然昔日之粗淺。實爲今日精深之基礎。然則研究科學者不當自考古始耶。

科學之範圍甚廣。如數學物理學化學地質學生物學社會學等皆是。其間以數

學發明最早。乃科學之基礎。社會學自近今斯賓塞爾孔德二氏研究後。始卓然成一學科。社會學所以成立若是之晚。蓋亦有故。因其範圍極廣。異常繁複。雖名為專科。實則包涵一切科學於內。既需生物學爲之印證。復欲諳習各地之政教風土人情及其沿革。故不易確定公例。研究社會科學者。其常識必異常豐富。若淺見寡聞之輩。勉強研究之結果。必至乖謬百出。是非莫辨。非傾於主觀。卽偏於客觀。傾於主觀者。如戴有顏色之眼鏡。其眼光眩惑靡定。偏於客觀者。則視社會若機械不明其演進之意義。兩種偏頗之結果。必致產生武斷。而失去研究之作用。然則必如何始能從事研究哉。曰歷史與科學並重而已。以歷史資料。用比較法剖析之統計法歸納之。而定爲公例則能具有正確之論據而獲適當之結果。蓋歷史乃人類演出之事跡。一切紀載屬於事實的。取作資料。自無不當之虞。惟紀載翔實與否。則關係綦鉅。歷史上之紀載。每有因其時環境與背景之關係。而失之太過與不及者。於是不得不有賴於研究歷史的方法。

章序

現在中國的一切現象，其複雜真是莫可名狀，然而我們稍一留心，不難知其所以致複雜的原因，我們概括的說一句，一切總不免多少有一點不明時代的關係，再明白點說，就是「誤認時代的抵觸」爲今日中國一切根本的糾紛，例如學術界的「學究」與「時髦」之衝突；政治上的「腐化」與「惡化」之爭鬥；社會上的「守舊」與「維新」之固執；實際皆不過因了時代上的觀念不同而已

自從孔德說我們今日所經的時代，叫做科學時代，於是對於時代的判別，便有了標準，但是什麼叫做科學，至今還是衆說紛紜，莫衷一是，我們見到法國的涂爾幹氏 (Durkheim) 說過一箇定義，比較的確切，他說：『人類的「回想」是先科學而存在的，科學不過是證實「回想」的一箇方法』由此我們可以說

所謂科學時代者，就是以方法來處理一切的時代，若是再簡單點說，亦可命之爲：「方法時代」，也不爲過。

我們若認上述的話爲是的，則一切拆得開，合得籠的精密方法，爲現在處理一切的重要工具，固不待言了！學友張定中兄，在歐洲苦讀多年，爲同學中難得人物，對於自然歷史諸科，尤多心得，於教授之餘，特譯辛氏「社會科學與歷史方法」此書固早爲世界名著之一，加之由這位有力的誠實譯者，譯成中文，以其專門學力，譯釋其曾經熟讀之書，自是與衆不同，從此國內讀書界又得一治學的好工具，這是我們應當感激這位譯者的。

我們中國有一句任誰都會說的難言，就是所謂：「一部二十四史，不知從何處說起」就這一句話，便可知道研究中國歷史的困難了。本書的詳細內容，請讀者細讀後自可明白，但在一開卷時，說過大概，也不可少！全書共分兩大編，上編詳說適於一切社會科學的歷史方法，下編則關於社會史之歷史方法；而

對於一切鑒別史料之研究方法，特別精細，我們若能用之於中國史中，不獨將上述的那句難言變爲：「二十四史有說法，」并且或者可以將中國文化整理一下，不問其好害，給以真確的證據，使那班「學究」「時髦」「腐化」「惡化」「守舊」「維新」的人物，既失其偏見的根據地，自然而然的中和起來，無所用其爭鬥了！所以今日中國在學術上需要一切的方法學：(Methodologie)在治事上也是要有一切合式的方法，自然不會弄到滿社會的新鮮活人，有的說着開天闢地的八卦話，有的硬要捨近求遠的，把箇慣用的「吃飯問題」，說做生硬的「麵包問題」的笑話了！最後一句，從此以後，希望大家認明今日是科學時代，亦即是方法時代，便什麼也不會有錯誤了！

章桐 一九二九，三，二一·南京

必先具有分析與綜合的方法。而後始有準繩。無論紀載若何。其中謬誤之點。或過或不及。俱能灼知洞見矣。此就主觀方面言之。至於客觀。則非借重科學不爲功。必須有古生物學爲之印證。地質學爲之參攷。始能免於偏重主觀之弊。蓋歷史僅紀載開化以後人類演出之事跡。若夫未開化以前。原人時代無文字紀載時。則不能不假借地質學與古生物學從而研究之。如原人時代人類生活之狀況。人種之演進。皆能用地質學考據而得。而社會各種事物之變遷。則端有賴於古生物學與今生物學爲之印證。是故吾人研究社會學必先具有科學之根柢。與夫歷史之資料。及其研究的方法。具是數種學術。然後從事研究。則能成爲真正之科學。非復傾於理論的偏於幻想的文學哲學之比。而爲適應人生需要之真正科學矣。此張君宗文所以有本書之輯。不可謂非現代學術界之一大貢獻也。爰樂爲之序。

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下旬褚民誼序於中法國立工業專門學校